

# 一对兄弟,两极的冷暖

□张无极



《鲁迅与周作人》  
孙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11月

一对兄弟,两条道路,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学史——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没有沉溺于兄弟失和的八卦猎奇,也没有陷入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而是以史料为骨、思想为魂,用温润而锋利的笔锋,解剖了20世纪中国最具张力的一对文化符号。

孙郁的解读,始于“同源”二字——鲁迅与周作人的精神底色,早已在绍兴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埋下伏笔。共同浸润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从《山海经》到《聊斋志异》,从私塾先生的启蒙到家族变故的冲击,相似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们对“人”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天然疏离。孙郁没有将这种同源简单归结为童年影响,而是点出核心:绍兴文化中越地风骨与乡土温情的双重特质,分别在后来的鲁迅与周作人身上,生长出不同的精神枝干。

东京留学时期,是兄弟二人思想的黄金共鸣期。孙郁引用大量书信与日记史料,还原了他们共同翻译域外小说、创办《新生》杂志的热血岁月。彼时的他们,都以“立人”为初心,渴望通过文学唤醒国

民精神,打破封建文化的桎梏。鲁迅的“救救孩子”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此时形成思想合力,共同指向“启蒙”的核心目标。

他通过细节对比,揭示了兄弟二人的天性差异:鲁迅敏感、尖锐,对黑暗有着天生的警惕与反抗欲;周作人温和、内敛,更倾向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天性差异,在后来的时代浪潮中被不断放大,最终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思想分歧。但在东京岁月里,这种差异被共同的理想包裹,成为他们思想互补的动力,也让这段“同源之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精神图景之一。

“兄弟失和”是绕不开的节点,但孙郁没有停留在家庭恩怨的表层解读,而是将其视为思想分野的外在显影。他在书中清晰勾勒出分歧的三个关键维度,让“歧路”的出现显得必然而非偶然。

第一个维度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鲁迅对传统文化持“决绝的批判”态度,将其视为“吃人的礼教”,主张“破而后立”,以锋利的笔触撕开封建文化的虚伪面纱;周作人则主张“宽容地接纳”,认为传统文化

中既有糟粕,也有“人的元素”,倡导“拿来主义”式的融合,试图在封建文化的土壤里培育现代性的种子。

第二个维度是对“启蒙”方式的认知。鲁迅选择“杂文”作为武器,以“匕首投枪”式的文字直面现实,在与黑暗的正面交锋中唤醒民众;周作人则选择“随笔”作为载体,以“苦茶庵”式的冲淡文字,倡导“生活的艺术”,试图通过个体精神的觉醒实现社会的渐进改良。

第三个维度是对时代变局的回应。面对社会动荡与政治高压,鲁迅选择“横站”,始终坚守批判者的立场,哪怕“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也绝不妥协;周作人则选择“退隐”,试图在乱世中寻找“自己的园地”,却最终在时代的漩涡中陷入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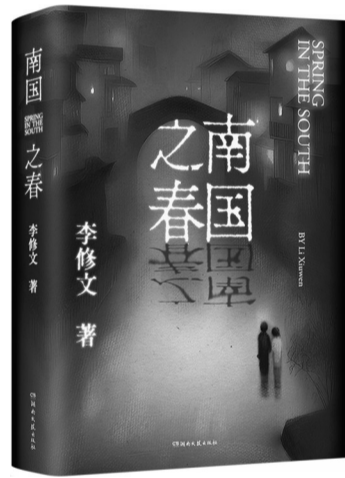
孙郁的评析,不止于思想层面,更深入文学实践的肌理,将鲁迅与周作人的文学创作视为思想的具象化表达。两人的文学风格,恰是其思想主张的完美镜像,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坐标系。鲁迅的文学世界,是“批判与救赎”的共生体。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

传》,以荒诞的叙事揭露国民性的弱点;他的散文,以锋利的逻辑批判社会的黑暗;哪怕是《朝花夕拾》中的温情回忆,也暗含着对现实的关照。周作人的文学世界,是“冲淡与闲适”的理想国。他的随笔《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以平淡的笔触谈论生活琐事、草木虫鱼,倡导“人的生活”与“美的趣味”;他的译文,注重“忠实与流畅”,试图将域外文化的精髓融入中国文学的传统。

孙郁没有将两种风格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其“互补性”——鲁迅的“批判”为现代文学注入了精神锋芒,让文学成为干预现实的力量;周作人的“闲适”为现代文学开辟了审美空间,让文学成为安顿心灵的港湾。两人的文学实践,共同回答了“现代文学何为”的核心命题,也为后来的创作者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珍贵的文学范式。孙郁用史料说话,用理性分析,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兼具了散文的可读性,让读者在读懂鲁迅与周作人的同时,更读懂了现代中国的精神困境与发展脉络。

# 平凡的生命也有盎然的春天

□刘昌宇



《南国之春》  
李修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11月

隆冬时节,品读李修文的《南国之春》,似有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来,顿觉沁人心脾。这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的新作,如同他笔下那些在泥泞中挣扎却依然挺立的生命,带着一种倔强的温柔。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喧嚣淹没,而李修文的文字却像一股清泉,缓缓流淌进心田,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力量。

《南国之春》收录了《南国之春》《到祁连山去》《七月半》三篇中篇作品。在主打篇目《南国之春》里,年轻男女在爱欲与现实的夹缝中颠沛流离,他们的爱情像春日里突然倒下的木棉,绚烂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作者用近乎残酷的笔触,将青春的热烈与现实的冰冷交织在一起,让人想起那些在出租屋里争吵又相拥的夜晚,想起地铁口被雨水打湿的玫瑰花。这些场景如此真实,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不禁反思:在物质与情感的博弈中,我们是否也曾迷失过方向?

《到祁连山去》则是一曲底层青年的悲歌。在职业泥潭中摸爬滚打的他们,像被扔进沙漠的种

子,拼命向下扎根。作者没有刻意美化苦难,而是用显微镜般的笔法,捕捉到这些年轻人如何在深夜加班后,用一碗泡面慰藉疲惫的灵魂。那些被生活磨出的茧子,反而成了他们最坚硬的铠甲。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人联想到我们身边那些默默奋斗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行动诠释着生命的尊严。

最让人动容的是《七月半》,那个屡战屡败却忠于信仰的小生意人。他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永远在路上的亲戚朋友,他们的失败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如何在破产后依然保持体面,如何在除夕夜独自守店时,用手机循环播放《恭喜发财》。这种荒诞中的坚守,恰恰是时代最真实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人性的光辉依然能够照亮前行的道路。

三篇中篇故事如同三幅水墨画卷徐徐展开。每一篇都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人在生活困境中的挣扎与坚守。在爱欲之火中颠沛流离的年轻男女,让我们看到爱情在

现实面前的脆弱与坚韧;在职业泥潭中摸爬滚打的底层青年,让我们感受到职场竞争的残酷与无奈;屡战屡败却忠于信仰的小生意人,让我们明白坚持梦想的可贵;经历精神创痛而苦苦挣扎的孤独旅人,让我们懂得在痛苦中寻找救赎的意义。这部作品,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深深扎根的人,致敬那些在命运风暴中依然挺起坚实脊背,在晦暗尘世间点燃生命之光的灵魂。

李修文的文字有种奇特的魔力,他写的是最普通的人,却总能在平凡中挖掘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笔下的人物没有英雄光环,他们会在失败后痛哭,会在成功前退缩,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特质,让他们显得格外真实。其实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些艰难时刻,将生命和心胸撑得阔大起来。看看早晨5点的街道,无数个夫妻档早餐铺开一天的烟火气;看看凌晨12点的城市,无数个外卖员送完单,正倚在车边歇一口气。这些平凡而坚韧的身影,恰恰构成了生活中最动人的风景。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

“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有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孤独与困境中,李修文却以狂暴而深情的文字,探寻了世相的荒诞与人性的幽微。他没有沉溺于对苦难的抱怨,而是通过笔下的人物,展现出生命在困境中迸发的惊人力量。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飞短流长,却如同野草般疯长的青春,蕴含着闪电般稍纵即逝的生命力。作者将《南国之春》视为一座埋葬着过往微小之事的衣冠冢,却坚信让这些微小之事得到祭奠,说不定就是天大的事。这种对平凡生活的敬畏与珍视,让这部作品充满了温暖与力量。

《南国之春》就像一盏灯,在人间奔波劳累的人,可以来到这盏灯下,相拥、确认。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要活成一株崭新的牡丹,在风雨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愿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的土壤里深深扎根,在命运的风暴中挺直脊梁,平凡的生命也有盎然的春天,人间珍贵,惟愿努力向上。

# 解码江南文雅文化的源流

□杏永乐



《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  
[日]中砂明德 著 江彦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11月

江南在国人心中始终是承载多重美好意蕴的文化符号,其内涵不仅指向高度发达的经济与高雅文化,更在当代彰显着先进观念的特质。自南宋以降,江南经济已远超北方。中晚明以降,其文化主导地位更是逐步确立。中砂明德所著《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以下简称《江南》)一书,核心议题即在于探究南宋之后江南何以成为“文雅文化”的源流,为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了关键视角。

需先厘清的是,《江南》对“江南”的界定与日常语境中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有所不同。《江南》一书中将福建等传统非江南地区纳入研究范畴,其合理性植根于“讨论文雅的源流”这一核心需求,这也是该书对“江南”的核心定义维度。尽管文化地域概念的边界本就模糊,但这一界定为跨区域文化脉络的梳理提供了必要前提。

从历史背景来看,江南文化超越北方并非瞬时事件,而是长期历

史演进的结果。中国北方长期受战乱侵袭,经济发展停滞,保存正统文化的重任逐渐转移至南方。而南方,尤其是江南,较少受战乱波及,经济持续繁荣,为文化崛起奠定了基础。不过,北方长期作为文化中心的惯性,使得江南的文化超越必然经历漫长的铺垫过程,这也正是《江南》以“源流”为副标题的核心意旨。

《江南》一书中没有直接对文雅文化给出具体定义,根据书本内容,作者中砂明德的文雅文化泛指江南地区出现的具有引领性质的文人文化,包括文人收藏、书籍出版以及精英培养等。《江南》一书从艺术品收藏、出版业发展、朱子学兴盛、《通鉴》家族繁衍、外敌应对与南人对外活动等多维度展开对文雅文化源流的探讨。书中开篇提及的董其昌山水“南北二宗论”,虽以水墨技法、皴法等为分类依据(非地域划分),却也从艺术理论维度印证了江南成熟文雅文化

的形成,成为文化主导地位确立的重要表征。同一时期,围绕董其昌和王世贞的收藏也变得流行,这表明江南文人的艺术品收藏活动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

从出版业的发展来看,江南苏州的出版业继承了福建建阳的行业基础并实现超越。建阳出版助力了朱子学的传播,使得朱子学成为南宋时期官方学问的重要来源,进而在此后对整个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建阳出版还以科举实用书籍和《通鉴》节本等通俗读物为主,这也促成通俗性质的历史书籍广泛传播,甚至传播到了海外,比如日本。继建阳出版业兴盛之后出现的苏州出版业则在装帧、刻版工艺与内容选择上全面升级,并且以质优的全本著作取代节本,成为江南文雅文化的重要载体。

《江南》一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具体议题的梳理,更在于其敞开的比较研究视野。既包括中国境内不同地域的文化对比,也为跨

国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参照,从而清晰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动因与脉络。同时,该书通过出版业等具体行业的兴衰切入文化研究,印证了从行业史视角探究文化演进的必要性。建阳出版业的繁盛为江南文雅文化的崛起提供了铺垫,而苏州出版业的超越则标志着江南文化的成熟,这一过程恰是文化吸纳、超越之逻辑的生动体现。

江南文化最终确立主导地位根源,正在于其兼收并蓄的特质。《江南》所论及的各个领域中,江南文化均实现了对其他地域同类文化的吸纳与升华,这也印证了“文化发展需以兼容并包为前提”的普遍真理。作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员,该书的海外研究视角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间接指出,国内学者拥有更丰富、更优质的文献资料,若能借鉴此类比较视野与跨学科方法,或将推动江南文化研究走向更深层。